

沈传亮◎著

ZHONGGUO

GAIGE WISHENMO

NENG CHENG GONG

改革为什么能成功？

中国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序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①这一经典语句是邓小平在30多年前提出来的。1978年10月，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到访日本后，曾感慨地说：“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访问美国，短短9天就刮起一场“邓旋风”，但他清醒地告诉我们，中国在某些方面和美国相差有50年。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促使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2014年金秋时节，前来北京参加APEC会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说他是第100次来中国。他认为，中国在1978年作出了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重大决策，那就是改革开放。40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中国无论遇到什么大风大浪，改革开放决策从未动摇过，国家发展因此收获中国奇迹、人间奇迹。中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梦想等越来越引起世人关注。通过中国近代一百多年历史上的最大变动、最新革命——改革开放，“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②。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②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成功？

敢字当头。没有敢闯敢干的精神，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勇气，跨越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同样需要勇气。共产党人独不缺这份胆识，党的主要领导人无论是邓小平还是习近平，都鼓励大胆拼搏积极进取。邓小平曾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①爱拼才会赢。从安徽小岗村村民深夜按下红手印到北京天安门附近摆起大碗茶摊，无不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改革过程中的闯劲拼劲和干劲。1992年初，已经88岁的邓小平，不辞辛苦风尘仆仆行走5000多公里南巡，并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邓小平这一历史性举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和勇于创新敢字当头的大担当。

积极学习。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应对挑战，要求执政党必须认真学习、积极学习、善于学习。邓小平说：“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派出大量学生，到欧美发达国家留学，学习西方治理智慧和管理经验。中国通过设立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多种方式，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通过推行“三来一补”，既解决了就业问题，还学会了现代管理。中国国务院总理亲自聘请世界银行专家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153页。

作为经济改革顾问。中国经过多年探索，在发展经济时引入市场力量，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不仅注重向国外学习，还注重提倡自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要积极学习、善于学习，并且指出只有依靠学习才能走向光辉未来。

保持定力。不折腾保持战略定力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道。中国共产党吸取20世纪的惨痛教训，深刻地认识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旦实施，必须毫不动摇地予以坚持。每逢重大争议出现，中国领导人都会表态支持已经颁布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了清醒的政策定力。针对有人对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姓“社”姓“资”的议论，邓小平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针对有人提出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个中心，邓小平说只有经济建设一个中心，“一百年不动摇”。针对有人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变化和发展私营经济进行非议，中央明确表示毫不动摇地发展私营经济，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针对有人对党的基本路线说三道四，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种“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因素。

与时俱进。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就不能保持自身活力并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这份难得的清醒，尤其是在指导性理论上做到了关键性的与时俱进。共产党为适应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巨大变化，不断调试自己，不断创新理论，使党的理论成为引领中国人前行的思想指南。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都是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中国人民在观念上和行为上都做到了与时俱进。打开国门后，中国人民积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立足为我所用，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进步。漫步北京、上海等现代都市街头，你会看到世界最潮的宣传品。即使走在中国的边疆小镇甚至农村，你也会看

序

到全球化的痕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的这种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精气神是中国前行的根本力量。

共建共享。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与执政党坚持人民立场、中国人民能从改革开放中不断获益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都很注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时代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每一步都有关于人民生活水平的表述。江泽民时代提出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时代提出要以人为本。走进新时代，习近平更是秉持人民中心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认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共同建设、共同分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在发现举措偏离这一理念时，共产党总是想尽办法来纠偏，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尽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是改革开放获得民众认同进而得以推进的根本。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众多，不仅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还有执政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中华文明的根深叶茂、国际环境的相对和平稳定等，但上面几条无疑最为关键、最为突出。这些成功密钥，只有当人们读懂中国改革开放后才能发现。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也还有很多障碍、困难、风险和挑战亟待克服。对此，我们也要时刻保持清醒。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登高望远，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为此，十九大在基本方略部分提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坚强有力的负有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那时中国也一定能重返世界之巅。

目 录

第一章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 一、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 1
- 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3
- 三、继续拨乱反正 / 6
-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阐释 / 9
- 五、敢闯敢试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 11

第二章 发展才是硬道理

-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15
- 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 19
- 三、非均衡发展 and 科教兴国 / 22
- 四、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 26

第三章 推动改革不动摇

- 一、从经济改革入手 / 29
- 二、改革渐进中有激进 / 32

三、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 / 34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37

第四章 大胆拥抱世界

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 41

二、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 / 44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47

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 50

第五章 健全民主法制不停步

一、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53

二、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60

三、推进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 63

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65

第六章 推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 71

二、促进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 / 74

三、发展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关系 / 77

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 83

第七章 走好和平发展道路

一、推动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 / 89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 92

三、建设强大的国防 / 94

四、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 97

第八章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治党务必从严 / 103

二、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108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 111

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 115	
第九章 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一、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 119	
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敢啃硬骨头 / 137	
三、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 147	
四、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 157	
五、坚决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 164	
六、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 170	
第十章 中国进入新时代	
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180	
二、新时代 新思维 新征程 新部署 / 182	
三、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 191	
结 语 / 194	
附 录 / 204	
后 记 / 225	

第一章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1976年10月，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中国命运迎来历史性大转折的契机。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在他主导下，真理标准大讨论取得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找到了一条一心一意建设现代化的新路。

一、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面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烂摊子，应该如何打开局面呢？其中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让党的领导人华国锋比较棘手。因为他既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要妥善处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就提议为邓小平平反。随后，在北京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向华国锋正式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华国锋有所顾虑。在1977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将自己的

顾虑谈了出来。他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但华国锋认为，如果打倒“四人帮”后马上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很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怕坏人从中煽动。所以他认为，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与中央的慎重不同，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77年1月8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很多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有的人还激情演讲。人们通过悼念周恩来，呼吁邓小平复出。这是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的整顿工作得到老百姓高度评价的结果。老百姓希望他早日出来为人民做点实事。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两个凡是”的提法正式出炉。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的错误也要坚决维护。这无形加大了邓小平复出的阻力，但叶剑英等依旧积极为邓小平复出做着准备。

其他老同志如陈云等人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呼吁让邓小平尽早出来工作。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老同志再次正式提出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的主旨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邓小平早日出山。陈云还就此同党内的其他老同志商量，他们都同意陈云的看法。陈云在会上专门做了书面发言：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发言说，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得到了耿飚等人的明确支持。这一呼声也引起了华国锋的回应。华国锋在会上表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恰当。

中央明确态度后，邓小平抓住时机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

邓小平的信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因为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可能出来工作。邓小平还表示：“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邓小平还表示自己工作中也有失误，并建议中央将信印发党内。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信下发至县团级。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顺应党心民意，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的复出预示着中国迎来了新的希望。

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项工作虽有所前进，但因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多年来的“左”倾错误，未能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真正解脱出来。“两个凡是”这个思想束缚打不破，中国便无法成功走出一条新路，更谈不上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也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对这种局面，老百姓不满意。“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渐渐受到了全党上下的反对和抵制，集中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副校长最后审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江苏、河南、福建的4家省报同时转载,随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大报纷纷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引起广泛注意,拉开了全国性讨论的序幕,宣告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

为什么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呢?因为这样可以绕过当时中央宣传部门的审查。如果送去审查,必然经过主管中央领导的批准,显然发不出来,所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用了这样一个办法,在党校内部刊物上发表,就表示经过了胡耀邦同志的审定,而《光明日报》可以顺利地以特约评论员发表。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依然相当大,该文观点受到一些人的严厉责难。有的人说,这是在丢刀子,砍旗,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很大压力。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关注,也得到了他们的坚决支持。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讲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这番掷地有声的话，不仅在讨论的关键时刻给予有力支持，而且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历史契机，显示出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关键时刻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践标准文章的姊妹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解放军报》发表的。罗瑞卿认为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他出国治病前还表示要是因为这篇文章受到责难，愿意挨四十大板！

为将讨论推向深入，继续推动解放思想的步伐，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离开北京先后到了广东、四川，期间他提出要解放思想，说有些地方认为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真是怪得很！9月又到东北力倡实事求是的精神。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东西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的“四处点火”，对于争取各地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此外，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都纷纷站出来支持这场讨论，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在经济建设上要量力而行。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多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军队各总部和各大军区也对此表态赞成。各省负责人也纷纷发表意见，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11月10日，全国表示支持讨论的省份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

这种现象表明，真理标准讨论已不是一个学术观点问题，而是一个

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终成燎原之势。这场讨论为党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和舆论准备。

在这次大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表现。全会实际上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三、继续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是消除“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后果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实现安定团结、顺利推进改革开放极为关键的一环。1976年10月12日，即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胡耀邦就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在此前初步平反冤假错案的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刀阔斧地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形成了全党办案的高潮。直接从事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有60万，其规模之大、进展之快是空前的，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而且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个部门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涉及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党内外知名人士的冤假错案；受到错误批判或诬陷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部门的冤假错案；地方性事件中的重大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以及涉及重大历史是非的案件。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复查结果

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所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在北京为刘少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彻底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究、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态度。

邓小平自始至终支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有关的批示和讲话不下数十次，并亲自过问有关案件，亲自参加有关人员的追悼会。据不完全统计，那两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3名含冤去世的同志献了花圈。

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任务，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冤假错案近2万件。^①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实事求是地全面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一）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解决地、富子女成分问题。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出身。”贯彻落实这个决定之后，全国先后约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约有2000多万人获得了正常的政治待遇。

（二）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的人改正。1979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

^①《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部和统战部召开的全国右派复查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的都要改正。”随后，为错划右派的改正、平反工作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到1981年上半年，改正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改正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同时，给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重新恢复或安排了工作、安置了生活，对一部分原来工作安排不当的人，重新作了调整。

（三）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为劳动者。按照中共中央1979年11月12日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个部门的请示报告，把1956年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错划为工商业者的70多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区别出来，恢复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成分。对于在原工商业者，中共中央批转文件，宣布他们今后在政治上应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四）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和去台湾人员在大陆的亲属落实政策。1979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六部委的请示报告，肯定起义、投诚是爱国行动，对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要做好善后工作，落实政策。11月1日，中共中央就“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发出通知，对他们落实了政策。

（五）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开始建立学位制度，恢复评定学术职称和技术职称；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一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得到使用。

（六）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1980年至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区问题座谈会，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中央和地方先后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人摘掉帽子。

（七）落实宗教政策。1982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文件，阐明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此前后，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各地的寺堂庙观陆续恢复和开放。

（八）落实侨务政策。华侨事务委员会于1978年12月召开工作会议，端正了侨务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发出多个文件，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的华侨、归侨和侨眷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遗留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闻阐释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犯过超越阶段的错误，没有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反而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毛泽东也曾提出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第一阶段的想法，但并未再深入思考和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不成熟、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时期。这篇讲话准备了相当长的时间，集中了全党智慧，是对新中国成立30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包括社会主义处在幼年时期这一观点就是新的，表明中国共产党小心翼翼的理论突破。

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①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并且指出：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必须对这种长期性和艰苦性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以后，党的十二大报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